

This document is downloaded from DR-NTU,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Library, Singapore.

Title	论李德裕的公文制作 = On LI Deyu ' s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documents
Author(s)	曲景毅 Qu, Jingyi
Citation	Qu, J. (2011). 论李德裕的公文制作 On LI Deyu ' s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Documents.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 Study on Sinology, 27, 47-74.
Date	2011
URL	http://hdl.handle.net/10220/41513
Rights	© 2011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RC. This is the author created version of a work that has been peer reviewed and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by Study on Sinolog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RC. It incorporates referee ' s comments but changes resulting from the publishing process, such as copyediting, structural formatting, may not be reflected in this document.

論李德裕的公文制作*

曲景毅

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2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47-74页

【提要】李德裕的制詔奏議在輔佐唐武宗成就“會昌中興”之不朽績業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德裕以文章德綏回鶻，以文章智平澤潞，其《會昌一品制集》是討胡平叛的中興實錄，是文章治天下的範型。德裕精於《漢書》、《左傳》，《左傳》尊王攘夷之大義與《漢書》旁博精萃之典實均鮮明地體現在其公文的寫作中，以古治今，援引“故事”，是其行文的顯著特徵。他的公文氣象雄毅，盡顯“英雄本色”，簡嚴中能盡事理，明白曉暢，辭情兼備，實現了經世致用與文采斐然、實用與美感的和諧統一。

李德裕（787—850），中晚唐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位飽受爭議的歷史人物，關於其生平業績傅璇琮先生《李德裕年譜》及相關論文分析已很詳細，勿庸贅述。文學（尤其是公文制作）方面亦成就斐然。開成五年（840）九月，德裕由淮南奉詔入相，開始了其六年相業。史稱其“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¹。所謂“天下安否系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²，會昌年間，武宗“專任德裕”，既能用之，且能信之委之，德裕“獨立不懼，經制四方”³，外討回鶻，內平澤潞，取得安內攘外雙重勝利，使“唐祚幾至中興”⁴。

德裕“決策論兵，舉無遺悔，以身捍難，功流社稷”，“語文章，則嚴、馬扶輪；論政事，則蕭、曹避席”⁵。宋代姚鉉稱“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⁶，以德裕之會昌政論文視之，可謂一語中的。德裕現存制詔書狀263篇之多⁷，其中制31、詔書（詔意、勅、賜書、敕旨）等43、冊文2、表6、奏疏6（題擬1）、狀157、書18（題擬1），它們不但是德裕文治武功的記錄，亦是文章治天下的範型。

一、討胡平叛之中興實錄——李德裕的文章之功

* 作者單位：曲景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

德裕曾於大中元年致書鄭亞稱：“某當先聖禦極，再參樞務，兩度冊文，及《宣懿太后初會廟制》、《聖容贊》、《幽州紀聖功碑》、《討回紇制》、《討劉稹制》、五度黠戛斯書，兩度用兵詔敕、告昊天上帝文並奏議等，勒成十五卷。”⁸此即著名的《會昌一品制集》，鄭亞在後來的序中稱此集“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⁹，認為武宗之聖德與德裕之勳業盡在其中。查索唐代按文類編集者，此可與陸贄《翰苑集》、《陸宣公奏議》相提並論。而由臣子之如椽巨筆記述一朝盛事者，唯德裕此集。故清人陳鴻墀評“德裕所上詔意敕書意至多，為唐人文集所僅見，其籌邊之策，經世之文，俱略備於此矣。”¹⁰

前人評云：“會昌功烈，非衛公孰能形容之？”¹¹可以這樣說，會昌中興並非單純務武，德裕“料敵制勝”、“罔有虛發”（《舊唐書·李德裕傳》）的文章功效不容忽略，正所謂“文章之功，省力於長槍大劍如此”¹²。《會昌一品制集》中的制詔書狀見證了其德綏北狄與智平澤潞的整個過程，試以其文勾勒之。

1、以文章德綏北狄

唐自高宗以後，吐蕃與回鶻並為邊患，猶如宋之遼夏，唐王朝的主要策略是親回鶻而拒吐蕃，蓋回鶻與西漢之匈奴、初唐之突厥、吐蕃不同，“叛唐之時少”，“助唐之時多”，唐政府曾經採取和親和市的政策，聯合回鶻以平安史，抗吐蕃。會昌年間，德裕以德綏為主，修刑為輔的方略，“示信推恩”，兼以威制，“不傷官軍”，“以全取勝”，獲得了邊境幾十年的安寧。這一過程能清晰地德裕的制詔書狀中反映出來。

德裕認為：“自古禦戎，只有二道，一是厚加撫慰，二是以力驅除，此事利害較然，前古皆有明效。”¹³對回鶻兩部即分以制之，對唃廝囉部奉行“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的懷柔政策，離間拉攏的方式，力主德綏，使之逐步歸唐。會昌元年三月，德裕撰《賜背叛回鶻敕書》，勸其停止侵擾邊境，回歸故土，與此同時，令唐之守將不許與回鶻交兵。八月，德裕撰《賜回鶻唃廝囉等詔書》一面安撫唃廝囉，濟之以糧食，結為和好，一面力排眾議，不使邊將匆忙出擊。八月二十四日，德裕又撰《論田牟請許黨項讎復回鶻唃廝囉部落事狀》，對邊關防禦採取謹慎態度，防止田牟等“欲擊回鶻以求功”，認為唃廝囉並未犯邊，不宜使黨項等擊之而“大虧恩信”。主張安撫唃廝囉，為日後最終招撫，“以竭力扞邊”打下基礎。閏九月，張賈巡邊回，德裕撰《賜回鶻唃廝囉等詔》勸其擁立新可汗。會昌二年德裕先後撰有《授唃廝囉可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仍封懷化郡王制》、《論唃廝囉下將士二千六百一十八人賜號狀》等9篇制狀，有步驟有秩序且

細緻入微地對其歸降做妥善安置。

對於回鶻烏介部，德裕深諳“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授劉沔招撫回鶻使制》）之術，“每念戎事，務安生靈；既獲遠圖，宜恢長筭”（《授張仲武東面招撫回鶻使制》），先後撰寫《賜回鶻可汗書》（我國家統臨萬寓）、《賜回鶻可汗書意》、《賜回鶻可汗書》（朕自臨寰區）、《賜回鶻啞沒斯特勤等詔書》、《代忠順報回鶻宰相書意》、《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意》等書。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撫納之間，無所不至”（《賜回鶻可汗書》），俟時機成熟時則輔之以修刑，予以驅除。會昌元年十一月，德裕上書請派遣使臣到啞沒斯處訪尋太和公主下落，有《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狀》。烏介乙太和公主名義遣使入朝，欲借振武以居，此乃三國劉備借荊州以圖巴蜀之計，德裕撰《遣王會等安撫回鶻制》、《賜回鶻可汗書》同時發出，對其無理要求進行有理有力的駁斥。

會昌二年，德裕撰《賜回鶻書意》婉言拒絕烏介借振武之軍事重鎮以圖謀不軌，又撰《條疏太原以北邊備事宜狀》採取積極的防禦措施。與此同時，禁止邊將殺害回鶻投降者及俘虜，有《論天德軍捉到回鶻生口等狀》。對於回鶻入侵唐橫水柵，德裕絕不姑息，撰《請密詔塞上事宜狀》令劉沔、李忠順進擊，使之有所警懼，稱“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四月，德裕有《條疏應接天德討逐回鶻事宜狀》、《奏回鶻事宜狀》下令驅逐回鶻出唐邊界。八月，德裕上《討襲回鶻事宜狀》提出令石雄夜襲斫烏介營的計策，但因朝臣有異議而作罷。他在《驅逐回鶻事宜狀》提出了處理烏介的具體辦法，但以牛僧孺為首的部分朝臣則主張採取消極應對的態度，德裕對之一一加以辨駁，先後有《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聞奏謹具一一如後狀》、《牛僧孺等奉敕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謹連如前》。九月上旬，德裕撰《授劉沔招撫回鶻使制》、《授張仲武東面招撫回鶻使制》正式任命討伐回鶻的將帥，充實軍備，採集蕃馬，作實際部署。另有《請發鎮州馬軍狀》、《請市蕃馬狀》、《請契苾通等分領沙陀退渾馬軍共六千人狀》等。十二月，德裕奏《請發河中馬軍五百騎赴振武狀》、《請發李思忠進軍於保大柵屯集狀》、《賜劉沔張仲武密詔》等，作與烏介決戰準備，催促劉沔、張仲武進軍。會昌三年正月，石雄劉沔等採用突襲戰術在黑山大破回鶻烏介部，迎太和公主歸唐。捷書至，德裕撰《討回鶻制》，“佈告中外”，以示朝廷討之皆由自取，又撰《請更發兵山外邀擊回鶻狀》、《殄滅回鶻事宜狀》，強調“既已討除，須令殄滅”的原則，徹底剿滅其殘餘勢力。

至此，回鶻對唐的威脅基本解除，並在此後保持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和平與

安定。在處理回鶻問題上，李德裕可謂功不可沒，後人評價云：“唐時回鶻最強盛，武帝（宗）時為黠戛斯可汗所破，其一支奔天德塞下，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域，互六十裏，不見其後。回鶻及可汗雙來襲振武城居之，賴李德裕在朝，隨事應接，不為巨患。”¹⁴洵為的評。

2、以文章智平澤潞

自安史之亂後，“朝廷之權，散在四方”¹⁵，德宗皇帝奉行姑息主義，唐代藩鎮的驕悍使得皇帝儼然成為東周天子。憲宗元和短暫中興後，穆宗、敬宗時宰相蕭俛、段文昌倡言偃革尚文，施行“銷兵政策”，於是藩鎮復熾，“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並”¹⁶。唐中央力量變得十分薄弱，在姑息為常軌，伐叛為變態的大背景下，德裕“所曆方鎮，大著功效”¹⁷的經歷給了他平叛的經驗。他面臨危境，處亂不驚，深知平叛三鎮最為關鍵，故云“劉稹所恃者，河朔三鎮耳。但得魏博不與稹同，破之必矣”（《舊唐書·李德裕傳》），故“以一相而制禦三鎮，如運之掌”¹⁸，又以三鎮討平澤潞，化政治力量為軍事力量，利用有限的兵力，無大戰而獲大勝，最終蕩平叛亂。

會昌平澤潞與元和平淮蔡，德裕與裴度均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有一點不同，即裴度是親臨前線，而德裕是坐鎮後方，決策制勝依靠的是制詔文書，故其文章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視。

會昌元年，德裕首先於盧龍軍復亂，陳行泰、張絳相繼擁兵之際，成功地解決了這一危機，撰同題《論幽州事宜狀》二劄，責陳、張二人，並有《請令符澈與幽州大將書狀》、《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意》呼應。會昌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為盧龍節度使，相當於在河朔之北端置一據點，與關中相呼應，則所謂“三鎮”者，只余成德、魏博。故陳寅恪稱“如非文饒之策略，仲武未必遽為鎮將相”¹⁹。之後又降服二鎮，為平澤潞打下基礎。以藩制藩，統制河北三鎮共平澤潞。

會昌三年四月十九日，德裕撰《賜何重順詔》、《賜張仲武詔》，為討伐劉稹作軍事上的準備。五月初二，德裕撰《論昭義三軍請劉稹勾當軍務狀》，面對巨大的阻力，堅持討伐。五月十三，撰《討劉稹制》，命王元逵、何弘敬、陳夷行、劉沔及王茂元合力攻討。五月下旬，撰《代弘敬與澤潞軍將書》、《代彥佐與澤潞三軍書》，勸說諸將勿從劉稹叛逆。七月，撰《幽州鎮魏使狀》、《李回宣慰三道敕旨》，建議派李回出使，宣慰三州，命幽州張仲武討滅回鶻殘部，成德、魏博二鎮進軍澤潞。七月十七日，德裕發出“毋得取縣”以防借縣邀功之素弊：責元逵以邢州；以洺州責弘敬；以澤州責王茂元；以潞州責劉沔及李彥佐，撰《賜劉

沔茂元詔》，稍後王元逵率兵先於諸軍進入昭義境內，撰《授王元逵平章事制》贊其“拔宣務要害之壘，絕堯山應援之兵”，封其為同平章事以諷厲諸帥。十八日，德裕以石雄代李彥佐討平澤潞，撰《賜彥佐詔意》。八月，魏博何弘敬觀望形勢，逗留不進，故德裕詔河南王宰將忠武全軍，入魏博境內，分散賊勢，迫弘敬進戰，並撰有《請賜弘敬詔狀》、《論陳許兵馬狀》。八月十三日，河陽王茂元兵敗，朝中停戰之議又起，“議罷兵者蟻聚，請宥過者雷同”（《太尉衛公會昌一品制集序》），“議者鼎沸”，“上亦疑之”。德裕力勸武宗堅持戡亂到底，避免功虧一簣，於是浮言異議乃止，德裕調王宰守河陽以穩定澤潞南面戰線，有《論河陽事宜狀》第一狀、第二狀、《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制》等。九月下旬，德裕任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使代李彥佐，並增益其兵，有《授石雄晉絳行營節度使制》、《論石雄請添兵狀》。因為張仲武與劉沔有隙，李回和解不成，故徙沔鎮滑州，德裕撰《賜劉沔詔意》。

會昌四年正月初四，德裕上《論劉稹送款與李石狀》，稱劉稹為緩兵之計，李石不應受降。同時有《賜李石詔意》、《代李石與劉稹書》。恰在此時，河東楊弁作亂，罷兵之議又起，正月初五，德裕撰《論劉稹狀》、《宰相與王宰書》言雖有太原楊弁之亂，劉稹必不可恕，督其進兵。二月初三，撰《賜王宰詔意》，再次督責王宰進兵，不得遷延，同時還有《賜石雄詔意》與此大致相同。另有《賜劉沔詔意》，將劉沔由滑州調至河陽，監督王宰。二月八日，德裕撰《處置楊弁敕》。三月初一，奏請李回出使天井、冀氏，至王宰、石雄軍中宣慰，督其進軍，有《請遣制使至天井冀氏宣慰狀》。三月上旬，德裕任命李丕為晉州刺史，有《授李丕晉州刺史充冀氏行營攻討副使制》。四月，王宰進攻澤州，德裕撰《賜王宰詔意》、《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代李丕與郭誼書》，在軍事進攻的同時，對澤潞將領曉以利害，勸其早日歸降，實現分化。四月五日，德裕奏《魏城入賊路狀》，改變作戰部署，由魏城取武鄉直南攻潞州。閏七月中旬，撰《論鎮州奏事官高迪陳意見二事狀》、《續得高文端賊中事宜狀》、《賜王元逵何弘敬詔意》，探聽昭義內部虛實（這是德裕成功平叛的一大法寶），以採取對策，令各方盡速進軍。八月，郭宜殺劉稹，遣使奉表降於王宰，王宰奏其事，德裕以為郭誼罪不可赦，下定決心以武力懲辦首惡，達到以儆效尤的目的，有《賜潞州軍人敕書意》。九月中，誅殺郭誼等，德裕有《誅郭誼等敕》、《誅張穀等告示中外敕》。九月七日，盧鈞入潞州，昭義平，德裕有《宰相與盧鈞書》。

德裕曾既鎮中原，又曆邊疆，具有豐富的在地方邊鎮的從政經驗。他曾描述其制敵方略云：“多設反間，密用奇謀，使自歸心，豈勞兵力，歡鬯而動，取若拾遺。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賜緣邊諸鎮密詔意》）無論反間還是奇謀，或者其他戰略戰術，作為實際的軍事統帥，“自開成五年冬回紇至天德，至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首尾五年，其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軍中書詔，奏請雲合，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舊唐書·李德裕傳》）。“萬里勝負，決於帷中”（《太尉衛公會昌一品制集序》），《會昌一品制集》即是其“攻伐”之中“制作”的“典誥制命”合集，是討胡平叛的忠實記錄²⁰。十九世紀著名的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認為“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而政治文書有時恰是最好的戰爭利器，會昌年間的德綏回鶻與智平澤潞，即說明這一點。

二、李德裕的公文製作與《左傳》《漢書》之關係

史稱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舊唐書·李德裕傳》），及為相則學以致用，故其文章與兩書聯繫甚密，學術之至高境界即經世致用，德裕可謂得之。蓋《左傳》尊王攘夷之大義與《漢書》的旁博兼搜之典故分別對其文章製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1、尊王攘夷，“深全國體”

德裕的制詔奏議是其尊王攘夷思想的具體體現，基於唐王朝自肅代以來尾大不掉之積弱現實，將《春秋》尊王攘夷的大一統思想貫注於文章之中，意在尊國體，樹威信，使“朝廷尊，臣下肅”（《論朝廷事體狀》），以達到中興的目的。

德裕文書每以“深全國體”（《賜回鶻啞沒斯等詔》）為旨歸，嘗稱“有國之制，固須立防，朝廷法度，理當劃一”，“恩信不一，非撫禦之遠圖；賜與頻繁，隳朝廷之舊制”（《賜王元逵詔書》）；“王者之功，莫大於耀德戢兵，安人柔遠”（《謝賜錦彩銀器狀》）。這裡所謂尊王就是德裕力圖恢復唐王朝的中央權威，對方鎮節制，對叛藩採取堅決討伐；攘夷則主要是對回鶻等戎狄各部採取招撫和驅逐等方式，以掃除邊患，使“蠻夷震懾”（《上尊號玉冊文》）。當幽州發生兵變屢易節度使之時，他說“幽州旬月之內，移易三人，因此翻覆多端，亦要令其知愧”（《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意》）；當昭義叛亂之時，他說“若不加討伐，何以號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則藩鎮相效，自茲威令去矣”（《舊唐書·李德裕傳》）；當回鶻欲“借振武一城，權以可汗公主居住”之際，他則遵循“戎不亂華，國之

大典”（《授劉沔招撫回鶻使制》）的原則，以歷來“未有深入漢界，藉以一城”、此乃“亂中國之舊規”（《賜回鶻可汗書》）為由拒之。

（1）特別重視朝廷的權威

德裕為相以“不損朝廷威命”（《太原狀》）、“制置之間，須存遠大”（《賜回鶻可汗書》）為要義，故伐叛之前，則云“前代伐叛，皆須先論文誥，倘未柔服，則當臨以兵威”，“切要存以大信，示以優恩，撫納不悛”²¹。一旦見諸討伐，則“昭示四方，稱朝廷吊人伐罪之意”（《論赤頭赤心健兒等狀》）。平昭義時，“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敕為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各謂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新唐書·李德裕傳》）。德裕有著名的《討劉稹制》，開篇即言“定天下者，致風俗於大同，安人生者，齊法度於劃一”，強調國家制度的一統，故討劉稹實乃“建十二州之旗鼓，以列降人，削六十年之厲階，盡歸王化”²²。當劉稹兵敗欲降時，王宰不明事體，答應了其請降要求，德裕卻從國體立論，稱“只可令王宰失信，豈可損朝廷武威”，“須令全家面縛”（《論劉稹狀》），否則決不饒恕，表明朝廷的絕對權威不容侵犯，以昭義警戒四方，可謂殺一儆百。

德裕對回鶻的總體策略是“欲曲全恩信，告諭丁寧”，“縱要驅除，……常令曲在於彼”（《論回鶻事宜狀》），故“不用嚴辭諂讓，而多勸諭之言”²³。在對回鶻的一系列文章中，德裕盡顯上國風範止儀，曾云“蠻夷之情，不可開縱，若為之報怨，以快其心，則是不貴王臣，取笑戎狄”（《論故循州司馬杜元穎狀》）。他曾先後“有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太尉衛公會昌一品制集序》），恩威並施，最終使嗚沒斯部歸降。針對烏介部欲借振武一城居留之事，德裕接連撰三篇《回鶻可汗書（意）》，“溫言撫慰，而開諭曉晰，深得佈告諸蕃之體”²⁴，最終以弱勝強，成功驅除烏介部。

（2）讚頌中興，以尊王業

德裕“幼習儒風”（《進真容贊狀》），早年在翰林院“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舊唐書·李德裕傳》）深諳王者之言，會昌之中興偉績實賴德裕之“鴻筆”記之，他曾自謙“以淺陋之詞，上述鴻明之德”（《謝恩賜錦彩銀器狀》），引東漢王充言“古之帝王建德者，須鴻筆之臣褒述紀德”（《進上尊號玉冊文狀》）；“陛下神武雄斷，智出無方，震天威以霆聲，碎獯戎而瓦解，武功盛烈，高視百王，豈比周穆犬戎之征，荒服不至，漢武馬邑之詐，群帥無功，將垂耿光，宜著鴻筆。”（《進幽州紀聖功碑文狀》）在德裕的文章中屢發“中興”之歎，竭盡所能頌揚皇朝的神武器業。如“陛下所以丕承王業，為中興之君”（《黠

夏斯朝貢圖傳序》)、“故能懷異俗之心，盛中興之業”(《異域歸忠傳序》)、“唐運中興，天授大君”(《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贊》)等。

會昌元年，德裕撰寫闡發憲宗元和中興的重要文章《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狀文夾敘夾議，力贊憲宗中興之功績，高屋建瓴，氣勢恢宏，粲然可觀。會昌五年奉武宗之詔命撰《幽州紀聖功碑銘》，文中雖未有直接讚歎，但對武宗的中興業績稱頌最為有力。清人孫梅稱此文“經濟大文，英雄本色，自非兼資文武，未易學步邯鄲也”²⁵。文章本記張仲武之功績，但不同一般碑銘，沒有繁敘其先祖夫人子孫，而是將碑主之功名完全置於武宗中興之業、滅鶻之功下²⁶。文章分碑與銘兩部分。碑文開首即言：“豈不以諸侯有四夷之功，獻其戎捷，《春秋》舊典也；宗周納肅慎之貢，銘於楛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為元侯表，可以為後世法。”意在為各藩鎮樹立表率，“尊王攘夷”思想盡顯。接著敘述武帝業績，“當其時也，烽燧迭警，羽書狎至，人心大搖，群師沮氣。皇帝以軒後之威神，漢高之大略，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權，合而用之，以定王業，此議臣所以不敢望於清光也。”再論君臣遇合，“天地應而品物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龍躍而雲從，鶴鳴而子和”，“則知龍顏善將，任人傑而不疑，日角好謀，歎敵國而強意。”複敘回鶻，稱臣“百有餘年”而叛，烏介可汗“外是柔服，內有桀心”，“上乃賜公璽書，授以方略”，公則“戢以聽命，嚴而有威”，“於是據於莽平，環以武剛，首尾蛇伸，左右翼張。輕騎既合，奇鋒橫驚，如摧枯株，如博畜兔，攝讐者弗取，陸梁者皆僕，虜王侯貴人，計以千數。然後盡眾服聽，悉數系累，穀靜山空，靡有孑遺，橐駝馱駝，風澤而散，旃牆鬪幕，布野畢收，馬牛幾至於穀量，虜血殆同於川決，徑路寶刀，祭天金人，奇貨珍器，不可殫論。”²⁷詳述仲武平定回鶻過程，盛讚其“勛哉上將，光我中興”，條分縷析，嚴密周全。敘事與抒情兼融，文筆燦然且明白如話，可謂文質彬彬，與一般銘文徒然堆砌辭藻不同。

德裕與武宗誠“君臣之分，千載一時”(《舊唐書·李德裕傳》史臣語)，他曾深感君臣遇合之不易：“伏以自古臣得其君，最為難遇，非龍顏英主，良、平無以效其謀，非日角聖姿，寇、鄧莫能申其志，則知致理不由於臣力，成功皆系於上心。”(《謝恩不許讓官表狀》)德裕每每感念武宗對之重用，而使其得以實現宏圖，故不惜文墨，施展其“大手筆”才華，歌頌武宗。較為集中的潤色王業者為兩篇《上尊號冊文》，分別作於會昌二年和五年。詳細地概括了武宗朝前期的文治武功，對於唐王朝的中興與繼續繁盛，寄予了極大的希望與期待，亦是為

自己能有所作為感到無比的自豪。縱觀德裕的這些“大手筆”文字，我們可以看出，德裕並非虛泛地歌功頌德，而是富於實際內容，立意高遠，氣度恢巨集，顯示出強大的精神力量。

2、以漢史為綱，典實“衮衮”

前人每言唐人喜《文選》而宋人嗜《漢書》，李德裕則較為特殊，其家不置《文選》，而精於《西漢書》，作文每以漢史為綱，且文多用典，“衮衮可喜”（《新唐書·李德裕傳》），這在唐代文人中獨標風範。

《漢書》歷來被視作典故庫，唐初《漢書》學為顯學，清人趙翼對此有過較為詳盡地論述：“《漢書》之學，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為業。顏師古為太子承幹注《漢書》，解釋詳明，承幹表上之，太宗命編之秘閣。……當時《漢書》之學大行。又有劉伯莊撰《漢書音義》二十卷。秦景通與弟暉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者，非其指授，以為無法。又有劉納言，亦以《漢書》名家。（《敬播傳》）姚思廉少受《漢書》學於其父察。（《思廉傳》）思廉之孫班，以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為後之注《漢書》者隱其姓氏，攘為己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其家學。（《姚璠傳》）又顧胤撰《漢書古今集》二十卷。（《胤傳》）李善撰《漢書辨惑》三十卷。（《善傳》）王方慶嘗就任希古受《史記》、《漢書》，希古遷官，方慶仍隨之卒業。（《方慶傳》）他如郝處俊好讀《漢書》，能暗誦。（《處俊傳》）裴炎亦好《左氏傳》、《漢書》。（《炎傳》）此又唐人之究心《漢書》，各稟承舊說，不敢以意為穿鑿者也。”²⁸趙氏言簡意明地論述了唐初《漢書》學的發達，稱“當時《漢書》之學大行”。所可舉者，尚有沈遵《漢書問答》五卷；唐高宗好《漢書》，曾與郝處俊共同撰定《漢書》八十七卷。唐初一些文人學士亦精《漢書》，陸南金之祖陸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春秋》、《司馬史》、《班氏漢書》”²⁹；趙弘智“學通《三禮》、《史記》、《漢書》”³⁰；隋末瓦崗軍領袖李密“將《漢書》一帙於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書讀之”³¹。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年幼即通《漢書》，“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³²。唐代的邊將亦喜讀《漢書》，如哥舒翰、李光弼、渾瑊、郝士美等，以《漢書》培養性情與氣質，史載：“（哥舒）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疏財重氣，士多歸之。”³³他皆若此，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漢書》學至晚唐似已衰微，德裕熟讀史書，是晚唐較為突出的喜讀《漢書》而能出將入相的人物，其受《漢書》之影響至深，《漢書》語言的豐贍與雅潔、冷峻與深情、嚴謹與生動的特點，對於德裕的整體書寫風格均有著或隱或顯的作

用。

表現在德裕的制詔奏議上，所引典故以《漢書》最多，蓋“以漢喻唐”，與其行文注重信實與博洽的目標相符合。他能將古典與今典並用，皇帝名臣將相，信手拈來，恰如其分，多以“臣聞”、“昔……”、“古人云”、“古人稱”等引出典故，歷史與典實交織，或警戒君主，或致書蕃胡，或籌畫方略，或縱論人世，影響其文風者則朴質古雅，故前人評其“凡制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為古人焉”³⁴。翻檢其現存的 397 篇文章，發現德裕文多用典，但文風並不因此而佶屈聱牙。下面將其典故分作兩類進行探討。

第一，有意識地反復的重現某一類典故。比如為褒揚武宗的中興績業，經常會漢宣比武宗。在德裕的文章中，稱頌漢宣帝 14 次，主要表彰其在匈奴乖亂時厚撫呼韓單于，使邊境安寧六十年的事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大孝皇帝改名制》稱“漢宣帝柔服北夷，宏宣祖業，功德之盛，侔於周宣，禦曆十年，乃從美稱”³⁵，這與武宗德綏回鶻唃沒斯部歸降效命，並成功安定烏介部，使西北邊患得以解除頗為類似，故反復稱述這一典故，如《遣王會等安撫回鶻制》之“昔匈奴乖亂，呼韓款塞，漢宣帝轉粟賑救，權時施宜，故得三代稱藩，北邊罷警。前代令典，可不務乎？”《討回鶻制》之“昔漢宣帝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呼韓單于攜國歸命，入朝保塞，漢後所以有擁護之恩”；《論田牟請許黨項仇復回鶻唃沒斯部落事狀》之“漢宣帝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宜遣使吊問，救其災患。四夷聞之，鹹貴中國之仁義。’其後南單于果是臣服，六十年邊境無事”等等，武宗封賞唃沒斯正與“漢宣帝時，呼韓單于來朝京邑”（《謝宣示唃沒斯等冠帶訖圖狀》）得到封賞類，故德裕以“漢朝呼延邪單于款塞，其下大將烏厲屈、烏厲溫敦並來降附，漢宣帝封以列侯”（《賜回鶻可汗書意》）及“漢宣帝厚撫呼韓，代享其利”（《請賜回鶻唃沒斯等物詔狀》）比附。漢宣帝乃西漢“中興之主”，故德裕誇讚武宗之“會昌中興”時稱“暨於漢宣，北夷乖亂，呼韓慕義，郅支遠遁，則簡策著其美”（《上尊號玉冊文》）；“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去邪用相，有大舜之功，柔遠固存，臻漢宣之罪”（《讓官表》）；《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更引漢宣帝“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稱“有司奏請尊孝武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代代獻此”，“所謂隆道中興，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侔德矣”³⁶。凡此種種，均表達了德裕對武宗攘除外患，重振國威的讚歎，亦充滿了自己“功烈光明，佐武中興”

（《新唐書·李德裕傳》）的自豪。

第二，“戡亂以武，守業以文”，“文武之道，各隨其時”³⁷。德裕選擇恰當的文臣武將之典來提高文章的說服力。會昌年間唐王朝“營壘多虛”，兵力不足³⁸，德裕崇尚以智取勝，以少勝多，故喜用韓信等智帥的典故為文，如以《授王宰兼充河陽行營諸軍攻討使制》之“昔韓信建旗，出井陘之隘，鄧艾束馬，越陰平之艱，皆立奇功，稱為名將”；《賜王宰詔意》之“韓信襲曆下之軍”；《論劉稹狀》之“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是納降之後，潛兵掩襲”；《請問生口取賊計策狀》之“遠則韓信，近則李靖，皆臨列免死，後立殊勳，忽有其人，亦不可料”；反復使用韓信破田榮這一典故，希望王宰如韓信一樣出奇策，立奇功，故《授王宰兼充河陽行營諸軍攻討使制》以“昔韓信建旗，出井陘之隘，鄧艾束馬，越陰平之艱，皆立奇功，稱為名將”激勵之。德裕的作戰思維深具法家思想，主張“始於武功，終致刑措”（《上尊號玉冊文》），故對管仲、諸葛亮等法家代表人物亦頗為喜愛。梁啟超編《中國六大政治家》時將李德裕與管仲、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相提並論，實為卓見³⁹。

當戰火未起或銷煙散去之時，德裕能夠極力推行改革，革除弊政，他曾有感於漢景帝誅晁錯之誤，“漢景所以聞鄧公之說，恨晁錯之誅”（《論故循州司馬杜元穎狀》），而他本人在討伐劉稹時遭受停戰的非議，幾與漢代晁錯同一下場。他對漢代賈誼、汲黯等謹遵儒家典制，敢於針對秦朝敗俗提出改革的經緯之才、社稷之臣深為欣賞。以賈誼為例，《授李丕汾州刺史制》引賈誼“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之言，稱“若火焚岡而不改其貞，風振野而獨標其勁，臨危自奮，見義必為”，強調身負守土保疆之使用，具備堅貞不屈的精神，寫於長慶二年的《薦處士李源表》亦引用賈誼此典，稱“自天寶之後，俗尚浮華，士罕仗義，人懷苟免，至有棄城郭、委符節者，其身不以為恥，當代不以為非”，緬懷古典，痛恨當代。《論朝廷事體狀》引賈誼“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眾庶如地”之語，指出“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由將相重則君尊，其勢然也”的道理。

3、徵引“故事”，“援古為質”

與以上兩點聯繫在一起的是，德裕善於徵引“故事”，以古治今，史稱其“援古為質”（《新唐書·李德裕傳》），此乃德裕謀議的顯著特點。

這裏首先需要特別辨明的是，德裕文章中的“故事”意義有所不同，可以分作三類。第一，乃用“故事”之原意，指舊事、事蹟，如《唐故左神策軍護軍中

尉兼左街功德使知內侍省事劉公神道碑銘》之“公學富邱墳，智參神化，葉機贊命，發揮王猷，故事藹然，內廷繫賴”；《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上柱國扶風馬公神道碑銘》之“以某知公故事，見托斯文，刻石路隅，庶紀佳績，俾後代知天子聞鼓鼙而憶名將，鑒丹青而思老臣”；《祭唐叔文》之“餘元和中掌記戎幕，時因晉祠止雨，太保高平公命余為此文，嘗對諸從事稱賞，以為征唐叔故事迨無遺漏”；《劍池賦》之“雖人亡劍去，而故事可悲”。

第二，《會昌一品制集》“厘革故事”卷中的“故事”，則是指當朝或先朝的制度弊端，“厘革”乃改革之意，德裕意在革除舊弊，恢復古制。

第三，指先例或舊日的好的典章制度。《漢書·劉向傳》：“宣帝循武帝故事，招名儒俊材置左右。”⁴⁰這一類“故事”在德裕中表現地非常突出，又可分為以下四類：

漢代故事，如《論田群狀》之“伏見後漢時，河間尹入、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尹次兄初、史玉母渾，皆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漢帝哀之，並赦其死。既有故事，敢不密陳”，以東漢之典勸喻當今主上。有時僅以簡單一語點出，如《讓官表》之“複韋賢之故事”，《請立昭武廟狀》之“西漢故事，祖宗嘗所行幸，皆令郡國立廟”。屬於此類者尚有《賜回鶻可汗書意》、《武宗改名告天地文》、《議禮法等大事狀》、《幽州紀聖功碑銘》、《請賜澤潞四面節度使狀》、《謝恩不許讓官表狀》等。

國朝故事⁴¹，如《論時政記等狀》之“長壽二年，宰臣姚崇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關於紀述，史官疏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為《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向後坐日，每聞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其日知印宰臣撰錄，連署名封印，至歲末送史館”，主張恢復“時政記”制度以規範朝綱，革除弊政。屬於此類者尚有《請複中書舍人故事狀》、《駁馬不許至要官私第狀》、《請改單于大都護狀》等。

開元故事⁴²，《宰相再議添徽號狀》之“今者陛下蹈軒后之靈蹤，修開元之故事，進道不遺於尺璧，澄必已得於元珠，聖壽必過於殷宗，景化方躋於漢代”，希冀武宗一舉回復盛世。這樣的例子還有《進瑞橘賦狀》、《謝恩加特進階改封衛國公狀》等。

自立故事，《張仲武寄回鶻生口駝馬狀》之“臣等舊讀《實錄》不至遺忘，伏思累聖以來，未有此例。謹按《左傳》：‘諸侯不相遺俘。’昔魯受齊俘，見譏

左氏。諸侯尚為非禮，況在台臣？臣等忝備鈞衡，須謹繩墨，若苟受私遺，不守舊章，則何以上戴聖君，儀刑百辟？伏望聖恩盡許卻還，從此便為故事，仍望許臣與一書報答，令其深諭國體”。再如《賜黠戛斯書》、《進所撰黠戛斯書狀》等皆依此“回鶻故事”，這種將當代事蹟化為固定禮制的傾向，既反映了德裕“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感與儒者襟懷，也折射出在“立功”意識下的強烈進取心。

綜觀德裕文章中的“故事”，是一種頗為有意識的創作行為，我們可以得出幾點認識：

首先“厘革故事”與德裕文章中直接引用之“故事”在概念上有點模糊與對立，“厘革”之“故事”，“故事”乃為當朝制度中的弊端，而德裕直接引用之“故事”又恰是其所信奉遵從的舊制舊典，德裕似乎是在用前代或前朝的“好”“故事”革除當代的“壞”“故事”。

其次，這些“故事”反映出德裕主政會昌時，特別重視前代或先朝的典章制度，強調“式遵令典”（《仁聖文武章天成功大孝皇帝改名制》），“既遵舊典，尤愜眾情”（《宣懿皇后祔陵廟狀》），遵行古禮古制，“以申嚴敬”，“以修墜禮”，這表現在他對前代皇家禮法的恢復與尊崇，希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議禮法等大事狀》）、“臣子之道，因此正名”（《論公主上表狀》）、“不違禮意，感悅人心”（《奉宣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對不合古制禮法者，堅決予以改革，以提高皇室威信，恢復大唐昔日之盛世。《會昌一品制集》專門有《厘革故事》一卷⁴³，便是這一思想的產物。

再次，德裕治國有一種復古思想，旨在以古治今，故他的文章中常常會出現“西漢故事”、“漢朝故事”、“開元之故事”、“國朝故事”、“呼韓故事”、“回鶻故事”等，體現了德裕的為政之道。其中，尤為推崇漢代故事和開元故事，以古喻今，以前朝喻當代，以漢喻唐。他曾說：“暨漢之文景，尊奉黃老，理致刑措，時稱大康。開元中，元宗經始清宮，追尊元祖，闡繹道要，遂臻治平，六合晏然，四十餘年。”（《宰相再議添徽號狀》）武宗極奉道教，在征討回鶻、昭義之後，德裕力求追摹盛世故事，以求中興之治。

複次，從“故事”中可以反映德裕的為相藝術與監戒藝術。德裕以“故事”告誡前方將領，以“故事”封賞大臣，以“故事”治戎狄，以“故事”明禮法，其為相之道並非獨謀專斷，既有章可循，又注意眾議，“廣諮諏以定國”⁴⁴，有些“故事”乃引以為監戒，鑒察往事，警戒將來。

最後，我們還注意到，德裕的以“故事”為政，不限於“故事”二字的明確

提出，有些不以“故事”為名，然亦是“故事”，如《驅逐回鶻事宜狀》“伏以自兩漢每四夷有事，必令公卿集議，蓋以國之大事，最在戎機”；《代高平公進書畫狀》“伏以前代帝王，多求遺逸，朝觀夕覽，取鑒於斯”，等等。

三、李德裕制詔奏議之風貌

1、氣象雄毅，“英雄本色”

德裕本人“卓犖有大節”，主政僅五年有餘，則內討叛藩，外平戎狄，立下蓋世奇功，其為人處亂不驚，氣概非凡，史稱“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之時”（《新唐書·李德裕傳》）。當澤潞叛平的捷報傳來時，神色自若，“萬里來袁尚之頭顱，二塚葬蚩尤之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太尉衛公會昌一品制集序》）。這種氣質表現在文風上則“氣象雄毅，見事明審”，“鐘鐺球鼎，震曜耳目，非於喁細響所可及也”⁴⁵，此正所謂文如其人。

自古英雄多寂寥，德裕“性孤峭”，“以器業自負，特達不群”，鑄就了其堅毅的品質。會昌討胡平叛的成功，更多地是德裕個人的自信、果決、堅毅、智謀等因素起著作用，而“所草諸勅，皆深略瑋文，洞見萬里，直是相業所系，非徒以詞命見推”⁴⁶，蓋德裕並非只是一介儒生詞手，其運籌帷幄的攻心、速戰等戰略戰術顯示了一代大政治家之才略，而其氣勢恢宏的制詔書意則充分展示了其超凡的英雄氣概與膽識毅力。

試以平定昭義為例加以申述。“澤潞五州，據山東要害，河北連結，惟此制之。磁洛邢三州，入其腹內，國紀所在，實系安危”⁴⁷。德裕亦知“上党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太尉衛公會昌一品制集序》引），澤潞劉稹在乃叔劉從諫故後，希圖獲得與河北三鎮一樣的半獨立狀態，便公開與朝廷對立。德裕態度明確，堅決主張予以討伐。初議兵時，絕大多數朝臣均表示反對，史載“朝官上疏相繼，請依從諫例許之繼襲，而宰臣四人，亦有以出師非便者。德裕奏曰：‘如師出無功，臣請自當罪戾，請不累李紳、讓夷等。’”（《舊唐書·李德裕傳》）連友人李紳、李讓夷兩位宰相亦在反對者的行列中。史載當時“中外交章固爭，皆曰：‘悟功高，不可絕其嗣。又從諫畜兵萬，粟支十年，未可以破也。’”它宰相亦媿媿趨和，德裕獨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為兵，猶五攻昌霸，三越漢，況其下哉。然贏縮勝負，兵家之常，惟陛下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為浮議所搖，則有

功矣。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新唐書·李德裕傳》）太原楊弁叛亂，時“稹未下，朝廷益為憂。議者頗言兵皆可罷”，討伐隨時可能前功盡棄，德裕則獨排眾議，堅決繼續討伐，奏稱“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請舍稹而誅弁”，後人有評曰：“時昭義之亂未平而太原之變復起，非衛公之深識毅力百折不撓，則兩盜合而大局不可問矣。”⁴⁸

德裕將之雄毅氣韻貫之於文章中，且能因人制辭，盡顯英雄本色。對於反叛主腦劉稹，他曾多次以嚴辭痛斥魁首其罪孽，每稱其“罪惡貫盈，言詞甚悖”（《賜王宰詔意》）；“為子為臣，忠孝並棄，居喪求襲，阻命專權，數遣亂軍，侵軼鄰境。……悖言肆口，逆節滔天”（《代李石與劉稹書》）；“劉稹父子無功，皆負重釁，既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家屬祈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望朝廷降非常之澤，悖慢無禮，前古未聞”（《宰相與王宰書》），義正辭嚴，氣勢如虹。特別是《討劉稹制》一文，“特凜冽，有風霜之色”⁴⁹，開首即云：“定天下者，致風俗於大同；安生人者，齊法度於畫一。雖晉之欒趙，家有舊勳，漢之韓黥，身為佐命，至於幹紀亂律，罔不梟夷，禁暴除殘，古今大義。”曆述劉悟、劉從諫之悖逆，劉悟已然“招致死士，固護一方，逮於末年，已虧臣節”，劉從諫更甚，“生稟戾氣，幼習亂風，因跋扈之資，以專封壤，恃紀綱之律，以襲兵符，暫展執圭之儀，終無上綬之請。……誘受亡命，妄作妖言，中伺朝廷，潛圖左道。接壤戎帥，屢奏陰謀。”先後舉欒趙、韓黥、魏豹、公孫述等數典比附，稱其狂妄犯上之舉，已赫然昭彰，“顧荅卵之可矜，豈泉魚之自察？暨乎沉痼，曾靡哀鳴，猶駐將盡之魂，恣行邪僻之志，罔惑舊校，樹立狡童。中使挾醫，莫睹其朝服；近臣銜命，不入於壘門”，“逆節甚明，人神共棄”⁵⁰。讀此文人人皆欲殺劉稹而後快，能無勝乎？故康熙皇帝曾批註此文曰：“似此辭義嚴明，所謂制勝於廟堂也。”⁵¹

對劉氏叛亂的主要參與者斥之以“久懷怨望，得肆陰謀，或妄設妖言，成其逆志，或偽草章表，飾以悖詞，既無禮於君親，曾不愧於天地”，“夫為善者天報以福，為惡者天報以殃”（《誅張穀等告示中外敕》），故對其絕不容情，“理臙髒者不可以芒刃，圖蔓草者必絕乎本根，故前代陳甲兵以正其刑，伐鐘鼓以聲其罪，爰用重典，庶清亂邦”（《誅郭誼等敕》）。

對太原楊弁的叛亂深為不屑，絕不姑息，“楊弁起於卒伍，獲在偏裨，方屬徂征，敢為桀逆，追逐戎帥，嘯聚叛徒。朕姑務苟安，未加顯戮，舍其悖亂，令赴行營。遂駐南轅之軒，已盜北門之管，戰備符璽，並而竊之，啟石會重關，潛

輸逆稹，釋賈群縲綬，俾遠奸謀，惑榆社之義心，召橫水之同惡，蠱毒近發於懷袖，蟻壤幾漏於江河。康政等被粉邑之遺風，習華墟之有禮，遽亡臣節，仍助凶威，撫弦登陴，曾不興歎，以卵投石，自取滅亡。雖禁暴除殘，國之大典，然俾其陷辟，終用愧懷。”⁵²這是典型的駢文句法，以氣使文，酣暢淋漓。

對於敵我雙方的將士則每每“激勵將士，在感以大義”⁵³，所寫文書既令敵人叛將膽寒，前方將士亦為之感服，不愧為“大手筆”作法。對澤潞三軍將士則譴責中有勸服，運用心理戰瓦解其鬥志。《代彥佐與澤潞三軍書》云：“自天寶以後，兵起山東，惟澤潞一軍，不虧臣節。……六十年間，忠名尚在。”“奈何拒君親之命，從逆亂之謀？”稱述其對國家曾有的功績，“破朱滔之功未朽，擒從史之效又彰，誠動上元，忠貫白日，一軍盛美，可不惜哉！”故勸將屬“豈可舍累代之美名，忘近歲之深恥，將性命家族，以徇駮童，生為不忠之人，死為不臣之鬼？”“豈得臨難因循，為人受禍？”同樣，在《代宏敬與澤潞軍將書》在亦稱叛亂“既虧子道，深累國章，遠近聞知，無不駭聽”，“自是公等行詭譎之計，誣罔朝廷，凡所施為，事多矯詐。在朝廷須知事實，焉得不一一追問？”在《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云“況昭義艱難之後，常保忠名，興元之初，又著勳力”，“穆宗以劉稹祖宗，乘機變歸款，朝廷委以節義之軍，授以腹心之寄。豈謂移淄青舊染之俗，汙上黨為善之人，日往月來，群情如醉。今王師問罪，將及歲期，憫彼一方，迷而不返，皆以奉劉稹為義，實所懵然。且封壤城池，莫非王土，軍人黎庶，豈非王臣？”末以古典曉之利害，“昔晉侯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讎，公等豈無誠心，見此事理？”德裕善以反問句式，且說以“成敗利害”，有理有據，令人信服，氣勢奪人心魄。

對王宰、石雄、李石等前方一線將領，“詞鋒精整，足以壯鼓旗而新壁壘”⁵⁴，同時保持絕對的領袖權威，要求屬下堅決貫徹其旨意，“詞不過嚴，而意甚英決”⁵⁵。當劉稹兵敗偽降以求暫緩之時，德裕識破敵情，屢發文書告誡前方，主張一鼓而平澤潞，如《代李石與劉稹書》之“如擬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此暫延旬月之命，以偷頃刻之安，苟懷是心，誰敢保信？……至於事迫計窮，潛輸密款，偽詞變詐，無不備諳，今欲行之，必恐非計。”《賜李石詔意》之“比者河朔諸鎮，惟淄青變詐最多，劉悟隨來舊將，皆習見此事，察其情偽，深要精詳。”

“城孤援絕，情計已窮，所以密將款詞，歸命上相，恐是偷安旬月，潰緩王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況饋運日有所費，春作漸已及時，勞我師徒，恐非至計。卿與其要約，令面縛來降，卿即馳至界首，親自受納。苟不如此，且須進軍。必

不得因此遷延，令其得計。”⁵⁶《賜王宰詔意》之“邇來頗自知懼，方獻偽詞”，“然天奪其心，鬼迷其志，宋人已病，不告析骸之情，朱鮪乞降，曾無面縛之效。”引星占之術，證其“網羅不善之人”，末以“韓信襲曆下之軍，李靖剪陰山之寇，皆因敵心懈弛，故得機討不遺”激勵之早立奇功。

後人評德裕《幽州紀聖功碑銘》一文“經濟大文，英雄本色”⁵⁷。此言非虛，用之以形容德裕整個《會昌一品制集》，同樣適用。德裕以當朝鴻筆，坐鎮後方，秉筆撰文，從容裁決，這些制詔奏議無異於千軍萬馬，最大限度地發揮了文以致用的功效，誠如其《文章論》所云“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⁵⁸，德裕為文與其為相的非凡氣度互為表裏，宏大的氣勢貫穿文章，讀之使人心血沸騰，震曜耳目，故後世有識者稱其“雄奇駿偉，與陸宣公（贄）上下”⁵⁹。

2、“簡嚴中能盡事理”

在討平回鶻與伐叛澤潞的戰爭中需要簡單、快速、準確地佈置方略或應變舉措，文章一方面不能過於冗長枝蔓，故觀德裕會昌制詔奏議一般都三五百字，一事一議，約略形成一文一事制度，並影響於宋以後公文。在南宋時奏議公文形成法律條文：“奏陳公事，皆直述事狀。若名件不同應分送所屬而非一宗一事者，不得同為一狀。”⁶⁰會昌五年為政處理政務之外自行撰寫文書詔令奏狀數百篇，可見其出手之快。簡潔之外還需要嚴謹，言簡意賅，“切應事機”，故武宗稱“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⁶¹，普通學士確實難以應對這種緊張複雜的政治局面，惟有才氣、學識、氣度、威儀俱佳的“大手筆”德裕才堪其重任，前人稱其文“簡嚴中能盡事理”⁶²，所言非虛。

德裕長於以簡潔的語言概括事件的終始，在處置劉稹、楊弁、回鶻唃廝囉部、烏介部、紇圻斯可汗、吐蕃悉恒謀等錯綜複雜的事誼中，均顯示了較強的敘述概括能力。如《賜回鶻唃廝囉等詔書》云：“彼蕃自忠義毗伽可汗以來，代為親鄰，連降愛主，恩禮特異，古今莫及。”“昨遣嗣澤王溶吊冊先可汗回，始聞卿國中喪亂，諸部乖離。救患恤鄰，豈忘令典，方圖鎮撫，以命使臣。今又知堅昆等五族，深入凌虐，可汗被害，公主及新可汗撫越他所，未歸城邑，特勒等力不能制，思存遠圖，相率遁逃，萬里歸命。又知欲奉公主朝覲，忠謀不從，已逾大漠之南，同款五原之塞，發此單使，布其赤心。言念艱危，惻然軫歎，料卿等皆英酋貴族，羈寓沙場，懷土之情，如何可處？豈非欲討除外寇，匡復本蕃，抱此至忠，托於大援？但緣未知指的，難便聽從。又慮邊境守臣，見卿忽至，或懷疑阻，不副朕

心，故遣鴻臚卿張賈馳往安撫。”⁶³敘述井然有序，條理清晰，細心真誠，顧慮周全。

“文以載事，文以著言，則文貴其簡也。文簡而理周，斯得其簡也。”⁶⁴前人評德裕文“揣摩懸斷，曲中利害”⁶⁵，可謂一針見血。如《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意》云：“比聞海內之論，幽州師有紀律，人懷義心，河朔諸軍，以為楷模，今之所睹，異於是矣。”“取捨之間，蒼黃驟變。且舉棋不定，《春秋》所譏，遠近聞之，莫不嗤笑。旬月之內，移易三人，不可謂師有紀律矣；不俟朝旨，專自樹置，不可謂人懷義心矣。”⁶⁶一語道破其屢換主帥，自立而不得人心，語辭鋒利，切中要害。《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云：“回鶻立國立家，莫非唐德”，根據來書一一予以反駁，“來書又云：‘蕃人易動難安，加忿怒後，不可制得。’只如回鶻為紇圻斯所困，豈可一日暫忘，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固宜閔血枕戈，嘗膽思報，大雪冤恥，告謝幽魂。回鶻忿怒之心，合施於彼。而欲滅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此事？”言辭激烈強硬，陳以利害，“今弊邑恃回鶻之信，不憚回鶻之怒。若外與中國結怨，內為紇圻斯所排，遷集鳥徙，流離蓬轉，以沔揣度，終難取濟。”“今相公以偉才宏略，匡弼可汗，既無秩訾之明，謹於事大，又無駒支之辨，自達其誠，而欲絕累代之歡，興二國之禍，僞雖釋憾，何以載天？又古人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倘自改悔，實未為晚。”⁶⁷《論昭義三軍請劉稹勾當軍務狀》云：“伏以元和中李師道自擅一方，久為桀逆。及王師壓境，天網四陳，劉悟頗識轉禍之機，乃有納忠之效。朝廷獎其歸命，寵遇優渥，待以信臣，委之雄鎮。從諫因父歿，自總兵權，屬寶曆中政務因循，事歸苟且，與其符節，以紊國章。然猶恭守詔條，咨諏善道，亦修覲禮，一至闕庭，驟陟臺階，實非公議。爰自近歲，頗聚申兵，招致亡命之徒，遂成逋逃之藪，怵於邪說，自謂雄豪。及寢疾彌留，罔思臣節，又令紀綱舊校，誘動軍情，樹置駮童，再圖兵柄。”⁶⁸概述劉稹家世及反叛過程，簡明扼要，切中要害。

德裕每每在敘事之中兼以議論，如《賜緣邊諸鎮密詔意》云：“近者寇孽初平，海內無事，方欲永囊弓矢，保乂生人，國遠開邊，誠非朕志。然盛衰倚伏，皆有其時，古人云：‘聖人無巧，時變是守。’蓋惜其時也。昔漢武帝命將出師，輕齎深入，耗中國三十餘年，竟不得臣伏匈奴，蕩定沙漠，此未得其時也。至宣帝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壞亂危亡之機，單于稽首，三代稱藩，鋒燧不設，邊城晏開，此遭遇其時也。近則回鶻常以兵助中國，有戡難之功，朝廷累降姻親，歲致

繒絮，因我為緣，振服諸蕃，百有餘年，最為強盛。及本國衰亂，種落流離，景附北邊，猶為傑驚。因其入塞，暫舉偏師，遂大破穹廬，卻收公主，歸降甚眾，梟戮至多，一國銷亡，易於拉朽，豈非得其時也！”這是會昌五年二月撰寫的應對吐蕃方略的一篇詔意，文中簡筆描述了當時國內的情形，討胡與平叛的戰火銷煙剛剛逝去，一切百廢待興，實不應再挑起戰端，“永橐弓矢，保乂生人，國遠開邊，誠非朕志”十六字扼要的表明國家的基本邊境策略，並舉古典與今典為戒，說明時與不時的道理：漢武未得時而開邊導致國力巨損，漢宣則遇其時不費吹灰之力使呼韓歸降，回鶻由強轉弱之何其迅速，乃“得其時”矣。在此基礎上，表明了朝廷目前對於吐蕃的方針：“多設反間，密用奇謀，使自歸心，豈勞兵力，歡鬻而動，取若拾遺。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可謂深得用兵禦敵之道，並且能曉之以理：“今當其破滅之勢，正是倚伏之期”，“以直報怨，非是不守和盟”，故“制置之間，尤須密靜”⁶⁹。既守盟約，不貪圖小利，落井下石，又以靜制動，“務修實效”，夾敘夾議，有理有利，充分顯示了其對邊境形勢的估計與判斷能力。

這裏再談一下德裕文集中大量的狀體奏議。奏議，即大臣向皇帝陳述己見的文字。《說文》云：“奏，進也。”《論衡·對作》云：“上書謂之奏。”它的來源很早，《尚書》中的《伊訓》、《無逸》等即屬於此類。姚鼐《古文辭類纂·序》云：“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其文體特點是“誼忠而辭美”，針對具體政事而發，具有較強的論辯性。這類文字在古代公文中比重頗大，並名目繁多，以《文選》為例，有表、上書、啟、彈事、箋、奏記六類，選文共 39 篇。《文心雕龍》中的《章表》、《奏啟》、《議對》闡述了這類上行公文的基本特點。“唐制近臣上書言事用表，亦用狀。表辭多文，狀辭多質。……蓋以表之與狀，為體不同。……狀之為體，蓋純乎官文書也。”⁷⁰德裕狀體文 157 篇，佔其文章總數的八分之三強，均短小精悍，簡潔實用。這些狀體文又可分為賜狀、論狀、表狀等，均以“右”起首，狀後一般以“未審可否”結尾，有較強的模式化。其中，德裕的“論狀”奏議充分發揮了漢代政論文的風格。他與陸贄的狀體有一定的可比性，大體而言，陸贄反復申論娓娓動聽，以深切入情取勝，德裕雄奇駿偉講求氣勢，以析理精微見勝，陸贄相對更質樸平實，德裕相對更講究文采，陸贄文長，德裕精煉。以對後世的影響而言，德裕遠不如陸贄，但對當時為政來說，德裕更具實用性，陸贄故能於危難之際喚起朝廷上下的忠貞報國之情，然於複雜繁細的朝政公務與為相治國來說，就顯得愈來愈捉襟見肘，

不合時宜。

3、“明白曉暢”，辭情兼備

德裕的制誥奏議崇尚實用，“敦務實去華之美”（《奏銀妝具狀》），鄙棄浮議泛言，故其文虛詞套語較少，喜開門見山，直截了當，指陳其事。鄭亞稱其“文章等於訓傳”，訓傳本義為對詞語文句的解說，文章等於訓傳，即是說其文對文意解釋地詳明恰切，覽文意顯。德裕的文書均以實用明白為指歸，對回鶻等少數民族，“不為文言，遣其易會”（《進所撰黠戛斯書狀》），以淺顯之文字感動回鶻唃沒斯部，避免對唃沒斯部與烏介部的同時用兵；對澤潞叛將“不引古事，不飾虛詞，直指目前，易於取信”（《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以通俗之文字曉以大義，作為心理戰的媒介與無形武器，贏得高文端、李丕、王釗等劉稹部心腹將領的歸降，起到了極大的無形戰果。一些文字甚至隨意如白話，如以“了”字入文，如《賜王宰詔意》“故令中使專往，看卿處置，須待事了，方得遣回”⁷¹；《殄滅回鶻事宜狀》之“回鶻衰殘，取之在速，一切須令三月已前事了”；《請諸道進軍狀》之“即當秋毫不犯，直須待立功軍出潞州，新節度使入後，處置大段公事了，方得抽軍”；《天井冀氏事宜狀》之“今山東三州歸降已平了”；《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聞奏謹具一一如後狀》之“如此相守，何時得了”；《進所撰黠戛斯書狀》之“臣請待鄭肅等與語了撰述”，等等。德裕為文喜用典故，已如上述，但這並未影響其文意的表達。讀其文並不晦澀難懂，相反卻明白曉暢，意旨明確，“切於時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謀議論》）。故清人孫梅評其“明白曉暢，自足以伐敵國陰謀之計”⁷²，洵是的評。

德裕“才猷迥出，詞筆參長”，其文章並非乾癟煩躁的虛詞套語之累積，亦有至誠之語，“實非飾情”（《讓司空後舉太常卿王起自代狀》），其感人心的力量已見諸於對回鶻與對劉稹的強大宣傳功能。此舉《賜太和公主敕書》為例。太和公主乃憲宗之女，穆宗第十妹，武宗之親姑母，作為唐代第四位和親公主於長慶元年（821）五月遠嫁回鶻崇德可汗，一去廿載，後被黠戛斯破回鶻後送歸途中又被回鶻烏介部劫持，以此威脅唐政府借振武一城，會昌二年八月十五日，德裕撰寫此文，“詞意諄詳，妙有操縱”⁷³，文中以武宗口氣表達對姑母的思念與深情：“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履險難，備罹屯苦，朕每念於此，良用惘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深厚，比者望姑朝謁，再敘悲歡，倏已歲暮，寂無音耗。相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麾，必當流涕。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絕國蕭條，固難久處，旃牆罽幕，何以禦冬，肉飯酪漿，且非適口。

朕撫臨萬宇，子育群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況姑累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高明，必是懸鑒。”⁷⁴文章的後半段轉入烏介“不得以姑為詞”的婉言絕辭中，然這段對太和公主的真情流露亦足以感人，後人稱其“感之以情，諭之以理，措詞宛轉之中，不失嚴厲氣象，是謂得體”⁷⁵。

再如德裕大功之後所寫的謝恩與辭官表狀，對於封賞的推辭和功成身退的眷戀讀之亦觸人心脾。如《謝恩不許讓官表狀》云：“臣昨者以位高疾僕，器滿忌傾，實懷瞰室之憂，敢喜在閭之賀，輒陳微懇，退積慚惶。陛下察臣孤立事君，寵拔皆由於睿鑒，一心守道。”《讓太尉第三表》云：“臣伏念齒發雖雕，心力猶壯，實願贊陛下升平之運，見萬方仁壽之期；東封告成，大典鹹備，然後散金娛老，歸守邱園。”德裕曾有詩《雨後靜望愴然成咏》云：“只恨無功書史籍，豈悲臨老事戎軒。惟懷藥餌蠲衰病，為惜餘年報主恩。”表達了自己鞠躬盡瘁一心事上的赤膽忠心與不戀榮華甘心歸守的夙願，濃濃深情，非一般矯情飾詞可比。

德裕的某些應用性公文亦能做到“語直而意婉，文特妙於佈置”⁷⁶，蓋德裕並非只是視自身為最高行政長官，除了傳達具體指令之外，他能兼顧到語意的委婉與遣辭的藝術，“字斟句酌而真摯坦白之意自溢行間”⁷⁷，襟懷坦誠，不露斧鑿痕跡，更容易讓人接受，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出公文的效力。

明代大政治家張居正曾有云：“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之在眾，斷之在獨。”⁷⁸會昌年間，德裕為相，“首請政事，皆出中書”（《舊唐書·李德裕傳》），中豎不得專權，武宗對德裕“知而任能之，言從計行”（《新唐書·李德裕傳》），會昌五年四月德裕進獻其文十卷，其《進新舊文十卷狀》對自己的文學創作總結道：“往在弱齡，即好詞賦，性情所得，衰老不忘。屬吏職歲深，文業多廢，翊之所感，時乃成章。豈謂擊壤庸音，謬入帝堯之聽，巴渝末曲，猥蒙漢祖之知。”⁷⁹德裕所寫之制詔奏議氣勢恢宏，句語坦明，詞情懇切，簡嚴中能盡事理。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精於《左傳》和《漢書》的優長，徵引典故與故事，尊王攘夷，討胡平叛，實現了經世致用與文采斐然、實用與美感的和諧統一，他不愧為繼中唐陸贄之後的又一公文大家，在唐文發展史上應有一席之地。

注釋：

¹ 《新唐書·李德裕傳》，本文所引均自該書卷一八〇，中華書局 1975 年版，第 5327—5344 頁。以下不再一一出注。

² 《新唐書·皇甫鏘傳》，卷一六七，第 5113 頁。

³ 宋·范仲淹：《范文正集》，卷六《述夢詩序》，《四部叢刊初編》本。

-
- ⁴ 宋·李之儀：《姑溪居士集》，卷十七《書牛李事》，《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 ⁵ 《舊唐書·李德裕傳》，本文所引均自該書卷一七四，中華書局 1975 年版，第 4509—4530 頁。以下不再一一出注。
- ⁶ 姚鉉編，郭麐補遺：《唐文粹·序》，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7（1968）年版。
- ⁷ 參看筆者《唐代“大手筆”作家現存文章著錄匯考》，《古籍研究》2008 年卷下（總第 54 期），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5—132 頁。
- ⁸ 清·董誥等：《全唐文》，卷七〇七，《與桂州鄭中丞書》，中華書局 1983 年版，第 7260 頁。
- ⁹ 鄭亞：《太尉衛公會昌一品制集序》，本文所引該文均自《全唐文》，卷七三〇，第 7531—7533 頁，以下不再一一出注。
- ¹⁰ 《全唐文紀事》，卷一《體例》，中華書局 1959 年版，第 2 頁。
- ¹¹ 宋·無名氏：《李文饒文集》後序，《四部叢刊》本。
- ¹²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上，《全宋筆記》第三編·十，鄭州：大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0 頁。
- ¹³ 《全唐文》，卷七〇一，《請賜回鶻沒斯等物詔狀》，第 7200 頁。
- ¹⁴ 宋·孔平仲：《珣璜新論》，卷四，《全宋筆記》第二編·五，第 282 頁。
- ¹⁵ 《資治通鑒》卷二六二，韓偓語，中華書局 1956 年版，第 8554 頁。
- ¹⁶ 《新唐書》，卷六四《方鎮表序》，第 1759 頁。
- ¹⁷ 宋·孫甫：《唐史論斷》，卷下，清刻粵雅堂叢書本。
- ¹⁸ 宋·范祖禹：《唐鑒》，卷一〇，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01 頁。
- ¹⁹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0—41 頁。
- ²⁰ 關於德裕之創作印證武宗朝討胡平叛之歷史，可參看[美]Drompp, Michael Robert 的博士論文：《The writings of Li Te-yü as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 ang》，Indiana University, 1986.
- ²¹ 《全唐文》，卷七〇二，《請先降使至黨項屯集處狀》，第 7209 頁。
- ²² 《全唐文》，卷六九七，第 7162 頁。
- ²³ 清·徐乾學編：《禦制古文淵鑒》（二），卷三九，清康熙內府刻四色套印本。
- ²⁴ 《全唐文紀事·卷首》，第 30 頁。
- ²⁵ 《四六叢話》，卷一八，《歷代文話》本，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615 頁。
- ²⁶ 故前人評曰：“《平淮西碑》于諸將相皆稱官稱名，蓋歸功主上，自合如此。此文以紀聖為題，而篇中稱仲武為公，非體也。豈至此而藩鎮之勢愈重耶？”（明·王志堅編：《四六法海》，卷一一，明天啟刻本）
- ²⁷ 《全唐文》，卷七一一，第 7300—7301 頁。
- ²⁸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訂補本），卷二十《唐初三〈禮〉〈漢書〉〈文選〉之學》，中華書局 1984 年版，第 441 頁。
- ²⁹ 《新唐書》，卷一九五《孝友傳》，第 5583 頁。
- ³⁰ 《舊唐書》，卷一八八《孝友傳》，第 4922 頁。
- ³¹ 《舊唐書》，卷五三《李密傳》，第 2207 頁。
- ³² 《新唐書》，卷二〇一《王勃傳》，第 5739 頁。
- ³³ 《舊唐書》，卷一〇四《哥舒翰傳》，第 3212 頁。
- ³⁴ 宋·葉庭珪：《海錄碎事》，卷十八，明萬曆二十六年刻本。
- ³⁵ 《全唐文》，卷六九七，第 7162 頁。
- ³⁶ 《全唐文》，卷七〇六，第 7243—7244 頁。
- ³⁷ 《舊唐書》，卷二八《音樂一》唐太宗語，第 1045 頁。
- ³⁸ 參見湯承業《李德裕研究》關於德裕可掌握多少兵力之考證，臺灣學生書局，1974 年再版，第 216—218 頁。
- ³⁹ 《中國六大政治家》，上海：廣智書局 1910 年版。
- ⁴⁰ 漢·班固：《漢書》，卷三六，中華書局 1962 年版，第 1928 頁。

- ⁴¹ 按：《舊唐書·李德裕傳》德裕回答武宗討伐劉稹能否成功時，亦引用“故事”：“自艱難已來，列聖皆許三鎮嗣襲，已成故事。”亦可算作此類。
- ⁴² 按：狀中徵引“開元格”者亦可算作此類，《請准兵部依開元二年軍功格置跳蕩及第一第二功狀》四次引用“開元格”，《全唐文》，卷七〇二，第 7206—7207 頁。關於“開元格”的研究，可參見日本學者中村裕一：《唐代公文書研究》第七章《唐格に關する文書的考察——〈通典〉刑法典所載の“開元格”を中心に》中的前四節。東京：汲古書院 1991 年版，第 432—461 頁。
- ⁴³ 《會昌一品集》，文集卷第十一：《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論時政記等狀》、《論九宮貴神壇狀》、《論九宮貴神合是大祠狀》、《論冬至歲朝賀狀》、《請復中書舍人故事》、《議禮法等大事》、《請改單于大都護狀》、《公主上表》等 9 篇。
- ⁴⁴ 《全唐文紀事·卷首》，第 31 頁。
- ⁴⁵ 《禦制古文淵鑒》（二），卷四〇末之按語。
- ⁴⁶ 《禦制古文淵鑒》（二），卷三九評《討劉稹制》語。
- ⁴⁷ 《全唐文》，卷六四六，李絳《論澤潞事宜狀》，第 6537 頁。
- ⁴⁸ 清·李岳瑞：《李衛公》，《中國六大政治家》第四編，第 69 頁。
- ⁴⁹ 《禦制古文淵鑒》（二），卷三九。
- ⁵⁰ 《全唐文》，卷六九七，第 7162—7163 頁。
- ⁵¹ 《全唐文紀事·卷首》，第 30 頁。
- ⁵² 《全唐文》，卷六九九《處置楊弁敕》，第 7180 頁。
- ⁵³ 《禦制古文淵鑒》（二），卷三九，評《又賜王宰詔意》語。
- ⁵⁴ 《全唐文紀事·卷首》，評《賜石雄詔意》語，第 30 頁。
- ⁵⁵ 《全唐文紀事·卷首》，評《賜王宰詔意》語，第 31 頁。
- ⁵⁶ 《全唐文》，卷六九九，第 7176 頁。
- ⁵⁷ 《四六叢話》，卷一八，《歷代文話》本，第 4615 頁。
- ⁵⁸ 《全唐文》，卷七〇九，第 7280 頁。
- ⁵⁹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一七，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 ⁶⁰ 宋·謝深甫編撰，戴建國點校：《慶元條法事類》，卷一六《文書門》，楊一凡、田濤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冊 1，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4 頁。
- ⁶¹ 《資治通鑒》，卷二四七：“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第 7976 頁。
- ⁶² 《全唐文紀事·卷首》，第 30 頁。
- ⁶³ 《全唐文》，卷六九八，第 7171—7172 頁。
- ⁶⁴ 宋·陳騭：《文則·甲》，香港：香港中華書局 1977 年版，第 6 頁。
- ⁶⁵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一二，明萬曆刻本。
- ⁶⁶ 《全唐文》，卷七〇七，第 7253—7254 頁。
- ⁶⁷ 《全唐文》，卷七〇七，第 7253 頁。
- ⁶⁸ 《全唐文》，卷七〇一，第 7199 頁。
- ⁶⁹ 《全唐文》，卷六九九，第 7178—7179 頁。
- ⁷⁰ 許同莘著，王毓、孔德興校點：《公牘學史》，北京：檔案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7—88 頁。
- ⁷¹ 按：《賜石雄詔意》與此篇文意略同，亦有此句。
- ⁷² 《四六叢話》，卷六《制勅詔冊》，《歷代文話》本，第 4372 頁。
- ⁷³ 《全唐文紀事·卷首》，第 30 頁。
- ⁷⁴ 《全唐文》，卷六九九，第 7183 頁。
- ⁷⁵ 清·王文濡編：《唐文評注讀本》，冊下，《詔令類》，上海文明書局 1916 年 6 月初版，第 13 頁。
- ⁷⁶ 《全唐文紀事·卷首》，評《宰相與李執方書》語，第 31 頁。
- ⁷⁷ 《禦制古文淵鑒》（二），卷三九。

⁷⁸ 明·張居正：《陳六事疏》，《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六，明萬曆四十年唐國達刻本。

⁷⁹ 《全唐文》，卷七〇三，第 7217 頁。